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中青班项目”

从国际主义 到新国际主义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

郭树勇◎著

时事出版社

从国际主义到 新国际主义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

郭树勇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
郭树勇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0232-050-X

I. 从… II. 郭… III.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IV. D8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5705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址: www.shishishe.com

印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25 字数: 396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80 元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体系	(9)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一个开放而复杂的体系	(10)
第二节 以发展的、借鉴的态度推进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	(19)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形态转换的影响因素	(28)
第一节 时代主题	(30)
第二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角	(37)
第三节 国际社会结构与进程	(53)
第三章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互动	(60)
第一节 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是相互建构的关系	(61)
第二节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依存与转化关系： 以革命作为切入点	(69)
第三节 现代国际关系架构下国际主义的局限及其根源	(73)
第四节 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是一个发展的历史范畴	(79)
第四章 经典形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	(84)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思想	(84)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关系思想体系	(91)

第三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在发展形态的延续： 以托洛茨基为例·····	(104)
第五章	发展形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之发端·····	(108)
第一节	列宁国际关系思想形成的背景·····	(108)
第二节	列宁努力平衡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112)
第三节	列宁的国际关系思想·····	(121)
第四节	发展形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其他代表 人物：以布哈林为例·····	(129)
第六章	国际主义向民族主义的重大转折·····	(133)
第一节	斯大林的国际关系思想·····	(134)
第二节	发展形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的“民族 主义革命”·····	(142)
第三节	关于斯大林国际关系思想的解读与反思·····	(146)
第七章	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在中国语境的高度结合·····	(158)
第一节	毛泽东国际关系思想的基调是国际主义·····	(159)
第二节	毛泽东国际主义思想的四次民族主义化·····	(169)
第三节	对于毛泽东国际关系思想的量化分析·····	(183)
第四节	毛泽东国际关系思想既有革命性又有当代性·····	(193)
第八章	国际主义的低调与国家利益的高扬·····	(196)
第一节	当代形态向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际关系 思想转变·····	(196)
第二节	对邓小平国际关系思想的重新解读·····	(200)
第三节	邓小平国际关系思想的主要渊源·····	(223)
第九章	新国际主义的萌芽：再论邓小平的国际关系思想·····	(229)
第一节	邓小平新国际主义思想的萌芽·····	(230)
第二节	邓小平新国际主义的基本内容·····	(233)
第三节	邓小平新国际主义与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的继承性·····	(240)

第十章 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及其演化	(244)
第一节 20 世纪 20、30 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观念	(244)
第二节 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观念	(253)
第三节 20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观念	(257)
第四节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主义观念转变的四个推动因素	(259)
第五节 大国成长的关键时期与新国际主义	(264)

附表

表 1 当前国际社会的结构状况（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划分）	(57)
表 2 国际主义的不同阶段及其特征	(82)
表 3 列宁与第二国际关于民族问题理念的对比	(128)
表 4 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交往过程中的国际主义或民族主义	(148)
表 5 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四至十七大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国际形势部分）的简况	(150)
表 6 1950—1965 年 16 年间毛泽东审定文稿情况统计表	(185)
表 7 1950—1965 年 16 年间毛泽东审定外交文稿情况统计表	(188)
表 8 邓小平关于“世界战争可以避免”言论的提出过程	(203)
表 9 第三世界为建立国际新秩序而进行的努力	(236)
表 10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 16 个重要概念的出现次数	(266)

附录

1. 批判理论及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影响	(272)
2. 中国共产党宣言	(291)
3.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	(293)
4.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	(295)

5.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
决议案》 (296)
6.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300)
7.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307)
8.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 (309)
9.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311)
10.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
议决案》 (315)
11.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317)
12.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
(国际关系部分) (325)
13.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国际关系部分) (328)
1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国际关系部分) (332)
15.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代表会议的决议》 (339)
16.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国际关系部分) (345)
17.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国际关系部分) (351)
18.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国际关系部分) (355)
19.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国
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国际关系部分) (360)
20.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国际关系部分) (366)
21.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更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政治报告(国际关系部分) (371)

目 录

22.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政治报告（国际关系部分）	(374)
23.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国际关系部分）	(377)
索引	(379)
主要参考文献	(385)
后记	(391)

导 论

我们也许并不一定主张中国外交明确提出类似于新国际主义的口号，但强烈呼吁中国外交不能缺乏一定限度的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大国成长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双重要求。

按照国际关系理论的常识，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成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任何思想只有在其所适应的领域才能闪烁出最耀眼的光芒，除非它成为了全人类的信仰。现代国际关系史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成为全人类的信仰，也没有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在 20 世纪末甚至经历了也许是自产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学理与实践挑战。然而，在不少人都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抱之以唏嘘的时候，我们有理由从国家关怀和人类关怀的角度认真地研究它的持久的理论意义。

因为如果不去深入研究它，就难以理解，在马克思的个别观点显然已经不能适用于发展了的新情况下，为什么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仍然在坚持这种理论及其立场、观点与方法，并且正在为世界和平探索出一条创新的道路？为什么很大程度上用伟大思想家黑格尔、康德的思想所武装起来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没有解决当今世界永久和平的理论问题呢？为什么中东问题在似乎穷尽了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甚至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智慧之际正在向自我标榜新马克思主义的哈贝马斯及其忠实信徒们伸出求援之手？

“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

否，他们在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①“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当教条的机器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机器全都处在消失的过程中时，我们便不再有任何理由，其实只是借口，可以为逃脱这种责任辩解。没有这种责任感，也就不会有将来。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了他的某种精神。……马克思主义往何处去的确已是一个摆在和我们同处一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面前的问题了。”^②西方思想家或者说当代哲学界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德里达推崇马克思的名言，似乎像黑夜中的闪电一样在警醒着我们，如果马克思果真成为了现代人类思想财富的构成部分，我们就有理由从阅读他和他的思想中了解我们自身、我们所处的国际社会和我们的整个世界。

面对既熟悉又陌生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我们曾经着迷过，曾经困惑过，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在读罢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流派的精华作品之后，我们又想试图揭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神秘面纱”。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对于中国学界的多数青年学者之所以是熟悉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原理在基础教育和国民教育中已经耳熟能详：从关于人类历史是一部分阶级斗争的历史的结论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从工人没有祖国到武装保卫苏联；从第一国际的成立到共产国际的解散；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第三世界理论。之所以是陌生的，是因为当我们与西方学者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们阅读的经典文献往往过于狭窄，我们往往不能与发达国家的学者就一些现实和理论前沿问题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当西方学者提起“霸权研究”、“社会本体论”、“历史结构”、“世界体系”、“结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时，我们起初还误认为那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外的学术视野。

^① [法]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② [法]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3页。

之所以着迷过，是因为当我们放下熟记在心的国际政治教科书，去接触那些充满着人性、历史感、现实意识和哲学智慧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原著或译著时，沿着理想主义、政治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的道路追寻人类和平探索之途时，心潮澎湃地发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那些第一流的学者不是提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比如政治现实主义创始人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论述其帝国主义理论时，花费了很大的篇幅论述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结构现实主义创始人沃尔兹在其《人、战争与国家》一书中把马克思、列宁的国际政治观念作为论述其战争根源研究的基本参照系。如果说这两位大师基本上还是从学术批评的角度论及马克思主义的话，那么社会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温特、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阿什利、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科克斯、批判社会理论的代表人物林克耐特等等则间接受到吉登斯、哈贝马斯、德里达等当代欧洲顶级学术思想大师的影响，而后三者甚至是马克思的绝对崇拜者。有好奇心的学者不免要问，既然马克思持续地影响着当代西方思想界的灵魂人物，而这些灵魂人物又影响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一流学者，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理论领域熠熠光不断？

之所以困惑过，是因为我们一度尚不确定，从何处切入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堪为正途。新中国成立以来，甚至在苏联建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政治学者们想必都有过这种困惑。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甚至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也主要不是解决国际问题，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关于国际问题的天才观点并不是从学科意义上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这确实给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宁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寻找他们国际关系思想之间的连续性，其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寻找他们各自的国际关系理论系统性。更令人困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念之间有何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去与目前遭到的挫折又如何解释？不同历史阶段在外交政策上的冲突如何梳理？当实践的要求紧迫时，政治家喜欢从过去的经典词章中摘录去论证现实政策的合理性，而学者需要冷静地从历史与逻辑的发展中寻找规律。

我们认为，只要世界体系仍然是由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等几对基本的矛盾构成，马克思及其国际关系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就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只要世界秩序继续建立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就有其较大的学术市场^①；只要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阻碍人类解放的现代国际社会的异化力量持续不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就会大放光芒。当然，马克思主义虽然从其本原来讲是重视国际阶级斗争的，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首倡者，但这些内容在变化了的时代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了，它一定要在时代的发展中充实并赋予新的符合时代特色的主题与内容。总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熠光不断，不仅仅在于它保留了自身的精髓，而且在于它不断地推陈出新，兼收并蓄，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时代化、民族化、实践化，真正地达到了科学方法论、实证认识论与社会本体论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全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诸多同仁已经做出了多方面、很有启发的学术贡献。限于本人的学力与精力，不可能面面俱到，只是从弱水三千中取一瓢，且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具体地讲，笔者希望从以下观点、思路特别是从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互动的角度来探索研究其发展演变规律。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当前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不尽如人意固有其客观原因，但也有人们主观上思想认识上闭塞的原因。在今天的世界与今天的中国，马克思时代的人类解放形式、国

^① 据统计，截止1998年，占世界人口1%的最富人群收入相当于占世界人口57%的最穷人群收入，全球基尼系数已达0.66，也就是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了。近年来，以反全球化为主旨的世界社会论坛正在掀起一场反对“全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动，以缩小全球贫富差距及其社会后果。这场反资本主义运动旨在“建立一个联盟，反对一个建立在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暴力基础上的体系。正是这个体系将资本利益和资本统治的特权凌驾于人们的需求和愿望之上”。见[英]A.T.卡利尼科斯：《反资本主义宣言》（罗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转引自陈学明：“反资本主义宣言给予我们的启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8期，第77—78页。

际斗争内容以及从事解放事业的行为体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共处与和平竞争，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完全从马克思的原有概念体系中去获取今天国际政治与对外交往的精神食粮，显然是不够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它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也必须发展。具体地讲，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世界革命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前较长时段的任务；二是帝国主义也不是当前国际政治中危害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三是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力量组合；四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与合作仍属民族国家体制的基本规则范畴。因此，我们必须从变化了的世界交往与国际政治实践中，以及人类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养分，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成为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外交指导思想。

第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时，有必要作历史的比较研究。列宁曾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① 我们既不能拿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所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那样的话，任何有创新意义的观点与实践都有可能被教条主义排斥为异端；同时，我们也不能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看不到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本质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要判断历届政府及其行动，必须以它们所处的时代以及和它们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为尺度。”^② 这样的话，我们就面临着哲学中经常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本书拟从两种历史研究的路径展开讨论，即从双层历史发展视野的维度：第一层是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着眼于从《共产党宣言》问世到当代中国期间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演变；第二层是着眼于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演变。在章节安排上，第四至九章主要针对第一层研究视野（维度），而第十章及附录 2 至附录 23 主要属第二层研究视野（维度）。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1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4 卷，第 287 页。

第三，采取以国际政治社会学方法为核心的综合研究对于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有意义的。笔者认为，阶级与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切入点，社会革命与社会变迁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作为“政治社会学之父”的马克思也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大师。无论是世界交往、世界革命、还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都是主要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因此，运用社会学研究马克思国际政治思想是有意义的。

关于运用社会学研究马克思的国际关系思想，我们有必要回顾马克思的一段精彩的话：“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只有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①

在马克思看来，新世界的到来、人类的进步、共产主义的实现源于两种人类力量：一种是物质力量，一种是社会力量。物质力量最重要的内容是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但是仅仅是物质力量不足以推动历史的进步；关键是第二种力量，这一种力量的实质是“以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形式是“伟大的社会革命”，前提是“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条件是“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我们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这四个关键词，都是从政治社会学意义上作出的判断：“以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是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经济相互依赖形成的国际社会互动；“伟大的社会革命”则是从社会冲突的角度研究国际社会的变迁，强调“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说明了马克思是从社会阶级斗争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的；“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则是强调，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世界革命后要采取国际协调行动，形成一种国际会议或者协商机制，对国际事务进行国际治理，帮助落后民族完成革命和建设的任务。本书在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定量与定法相结合的方法的同时，较多地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2页。

及了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不同的国际社会结构与进程（世界体系）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演变，并且也试图得出结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注重融入国际社会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新国际主义的出现，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大国的理性选择。

第四，由于本书采取了一般地重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史与着重地强调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观念互动相结合的论述方式，因此后者占有相当多的篇幅，而且贯穿于全书的始终。之所以采取这种做法，一是因为国际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中的原生品质，民族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演变的一个重要伴随和干预变量，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完成的并以民族主义化了的国际主义形式表现出来。二是因为我们实在难以找出像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样的、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概念体系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原创性的其他概念来。但是，这并不是说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观念互动这种提法就完美无缺了，恰恰相反，这样的说法主要是便于研究需要。实际上，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并不是完全对立和对应的概念，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似乎更加对应一些；从严格的政治意义而非政治学意义上讲，将民族主义换成爱国主义也许更适宜。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较简便地将民族主义的历史意义阐述出来，也不能较直接和清楚地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并有可能在政治正确性与学术客观性之间兜圈子。^① 我们希望并相信，为了便于研究而将民族主义中性化且使之在学术含义上取得与爱国主义相近的界定，并不影响我们对政治信念的清晰表达。我们坚信，新时期我国外交应该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高度结合，在继续反对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继续遵循“不当头”的战略方针的同时，不断开拓进取与制度创新，在维护至高无上的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积极履行成长中的大国的合理和适当的国际责任。

^① 即使在我党的早期领导人看来，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有着基本的一致性。比如，瞿秋白在1924年5月4日写的题为《自民族主义至国际主义》的文章中第一句话就是：“五月七日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是中国近年来爱国运动——民族主义运动的出发点。”（《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

最后，本书沿用并致力于适当推进“新国际主义”的内涵。“新国际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在个别时期被短暂地使用过。然而，我们所指的“新国际主义”，则是指近几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与外交思想研究中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其主要含义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社会主义大国履行国际责任和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外在要求与内在品质。^①新国际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与中国新民族主义相对应的一种外交思潮。我们也许并不一定主张中国外交明确提出类似于新国际主义的口号，但强烈呼吁中国外交不能缺乏一定限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既然这已经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交往日益深化的国际社会，同时中国正建设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为人类努力做出更多的贡献，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大国就不可能追求绝对的国家利益。换言之，就必须担负一定的国际责任与国际义务。与过去不同的是，这种国际责任不是以世界革命主旨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延伸，而是以共同管理国际危机和建设全球社会为主旨的新型国际主义。时代主题变化了，国际主义的形式与内涵也变化了。美国等大国的成长历史表明，大国不能没有国际主义与理想主义，正如他不能没有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大国同样如此。一个成长中的负责任的大国出于外交策略可以不提具体的国际主义口号，但是不能没有国际主义的精神。从邓小平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到江泽民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再到胡锦涛近年提出的“和谐世界”，都反映了中国对于理想世界秩序的道德诉求，也表示了中国外交之国际义务的努力方向，无不体现了超出国家关怀之上的人类关怀，这种关怀难道不是新国际主义吗？

^① 秦亚青、朱立群：“新国际主义与中国外交”，《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体系

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列宁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理论）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

中国学界曾经积累了宝贵的研究经验，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其关于民族解放运动、列宁“和平共处”思想、殖民地经济、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论战、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现象等等方面的研究，成为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重要知识基础，也为外交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可以这么说，中国之所以避免步入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外政策模式，成功地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汪洋大海里始终能够战胜惊涛骇浪，除了战略文化、国内政治、社会基础和国际关系诸因素以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研究的成果对决策层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苏联解体后，昔日在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方面有突出优势的中国学界和苏东学界一度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研究低潮。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研究之所以进入低潮，一方面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社会主义运动发生转向，现实世界的巨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提出